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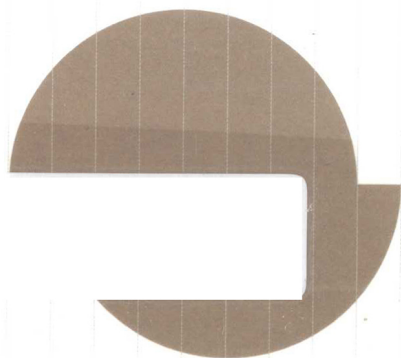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第二辑）

丛书主编 伍江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机理、动因与障碍

——一个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

程名望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第二辑）

丛书主编 伍江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机理、动因与障碍

——一个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

程名望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关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为描述和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机理、根本动因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并运用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对理论模型给予一定的检验和论证。从基本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来说,本书基于新古典主义、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三个视角,运用局部均衡、一般均衡、静态均衡、动态均衡等现代经济学分析模式,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较全面地研究了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特别是运用动态递归、博弈论、计量分析等前沿理论和方法,把传统农村经济问题和现代经济学前沿思想结合起来,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经济增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既对传统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也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生和政府相关部门人员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理、动因与障碍:一个理论框架
与实证分析/程名望著.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12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伍江主编.第2辑)

ISBN 978-7-5608-4994-2

I. ①中… II. ①程… III. ①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
转移-研究-中国 IV. ①F3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6918 号

同济大学人文社科丛书(第二辑)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理、动因与障碍

——一个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

程名望 著

责任编辑 沈志宏

责任校对 徐春莲

装帧设计 孙晓悦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875

印 数 1—1100

字 数 265 000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994-2

定 价 35.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同济人文社科丛书的第二辑和读者见面了。

和第一辑的七本书一样,这一辑也是选题广泛而无专题。作者均为来自同济各人文社科院系的教师,显示了近年同济人文社科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希望通过丛书这一形式,向读者展示一个近年同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整体状况和总体水平。当然,和国内各人文社科强校相比,同济的总体差距是明显的,但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

近年来,同济大学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我们相信,人文社科的发展对于同济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作为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不可或缺的领域。在当今世界知名一流大学里,即便是传统的以工科见长的大学,促进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也都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今人类新知识的产生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而文理交融又是学科交叉和知识融合中最重要的方面。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为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福祉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道德的挑战,工具理性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环境理性的质疑。人文精神的更多介入,正是科学技术跨越道德门槛的一个助推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同济大学在中国一流大学的队伍中一个助推器以工科见长,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卓越工程师,为祖国的建设和富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前苏联模式的单科式学科布局也为同济大学向着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局限。为此,同济大学近30年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多学科办学,特别是注重人文、社科领域和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学科发展,并将此看作是同济大学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必由之路。同济历史上曾经是一所理、工、文、法、医都名列国内前茅的大学,各学科相互支撑、相互交融使这所中国最早之一的大学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占据着难以撼动的地位。同济人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自我定位。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同济大学的学科已经覆盖工学、理学、管理学、医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哲学、艺术、教育

学等 10 大门类,真正重新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我们坚信,当今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扩充与突破更需要当代科学技术最新知识与最新成果的直接滋润,而当今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也更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直接介入。同济大学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同济大学在这方面责无旁贷。

然而,历史创伤的愈合需要时间。与超过百年连续办学历史的工科学科相比,同济的人文社科却命运多舛。在经过近半个世纪断裂后的学科接续与重振,既需要勇气(这一点我们已经具备),更需要长期积累与沉淀。厚积才能薄发。同济在这方面已做好准备,但需要时间。同时,同济也需要聚焦。人文社科领域浩瀚无边,后者更需要选择突破口。作为人类价值观的主要学术载体,今天的人文社科也面临着新的价值观的考验。人类道德已从传统的人际层面、族际层面和国际层面面向代际层面延伸。我们的人文社科学科能否担负起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考责任? 同济准备以此为契机,将之作为同济人文社科学科的突破口。

同济具备很多传统优势,也具备很多新的优势。同济有长期的对德合作和欧洲研究传统,我们在欧洲哲学与欧洲文化研究领域,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在艺术设计领域,都已形成国内领先的学术力量,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和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在管理学、经济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和职业教育学等学科领域也已集聚了相当的学术队伍。厚积仍在继续,薄发指日可待。我们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能够向读者打开一个关于同济人文社科领域的门缝。丛书中各位作者的学术深度必有参差,其中青年学者的作品也难免青涩。但我们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开端,起点不高却可长久持续。我们更希望通过丛书的出版能够激励起同济人文社科领域的同仁们更高的学术热情,从而付出更多的学术投入,获取更丰富的学术成果。

我们期待同济人文社科丛书越出越多,越出越好。



2012 年 10 月 30 日于同济绿园

序

当答应名望为本书写序的请求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应从哪几个角度来写这个序？苦思冥想两月有余，也未有个好的头绪。好在两年前对此曾有过一个思考。现顺着这一思考写起。

这本博士论文专著的主题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机理探索，可在进行研究综述时，大量的外文文献报道的却是人口迁徙问题。这不由得使我思考，转移和迁徙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内涵是否一致？

从哲学层次上看，迁徙应是一个组织的行为，诸如蜜蜂搬家，在蜂王的带领下整体从甲地向乙地迁徙。人类的迁徙行为似乎与此相似，在家长的带领下举家从甲地移至乙地。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迁徙遵循着这样一个道理：“人挪活，树挪死”。为了整个家庭组织生活更加美好，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无论是因工作调动还是为了寻求工作，其行为都是迁徙。从这个角度来看，迁徙有一种彻底性，尽管有重返故里的可能，但一般来说，重返的频率程度会很低，这是因为迁徙的成本很高。与此相对，转移似乎是单个人的事，也即单个人的行为。诸如工蜂外出采蜜，整天飞来飞去，但不论飞得多远，其行为的归结点或中心点仍是那个出发点，即家（或蜂窝）。工蜂转移即是以蜂窝为中心，以离窝外出距离为半径的一种圈内移动行为。劳动力转移似乎就属于这种行为。从这个层面上看，劳动力转移行为与迁徙行为不属于一类。

对照现实生活，我们发现，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似乎越来越有迁徙之本意，但又受各种各样制度的约束，使得这种迁徙呈现一种不彻底性，其行为绝大部分是一种转移行为。尽管在此过程中，融合了举家迁徙，但从制度层面上看，这种转移的不彻底并没有使劳动力的流动形成一种真正的迁徙。尽管有不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其行为属于举家外出，但居住的临时性与就业的短期性决定了其举家外出也仅仅是一种转移行为而非迁徙行为，就算是也只能算是一种迁徙行为的补充。

传统的中国，人类的活动既有迁徙行为，也有转移行为，且二者的存在都相对自由，能够满足“人挪活，树挪死”的家庭效应最大化规律要求。

但当时时间推进到20世纪中后期,僵硬的城乡户籍制度似乎将迁徙自由之门给堵死,区域间、城乡间的互动行为几乎丧失。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劳动力的就业圈也被严格地限定,人们被迫走上一种既没有劳动自由也没有迁徙可能的生活之路。这就是在中国存在了20多年的集体化思维。实践结果是,在失去劳动决策自由、迁徙无门的情景下,中国农民选择了一种“用偷懒惩罚偷懒”的办法来抵制这种城乡分隔的二元制度。尽管这种抵制到今天也没有达到完全消除迁徙藩篱的目标,但迫于经济发展压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层意识形态不得已用一种默认的形式认可农民私分集体土地的行为,最终通过这一行为实现了部分劳动自由决策权的回归。尽管我们知道,农地到户并非农民分地之本意^①,争取劳动自由才是本次行动的根本,但要实现劳动力的自由迁徙之目标,突破二元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难度相当大。这是因为,20多年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使得户籍制度所附着的东西实在太多,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城市利益集团)。尽管随着国家改革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由计划经济演变到市场经济,在政府强力引导下,乡村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得到了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也由改革前的农业社会演进到目前的工业社会,但计划经济时代下形成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发生的变化依旧非常有限,特别是大中城市,诸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户籍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开放程度几乎等于零^②。他们可以说是做着城里人的活,纳着城里人的税,享受着非城市人的待遇。尽管进入新世纪后,我们也看到不少有关城

① 这是因为农地到户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可以通过激发农民经营农地的积极性来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事实也是这样,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从改革前的3亿吨(1978年)升至4亿吨(1984年),用了6年时间;从4亿吨升至5亿吨(1996年),用了12年时间。在短短18年间,粮食总产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伴随着粮食总产量的持续上升,农民的收入却迎来了一个连续5年的徘徊下降(1997—2000年)。显然,实现农民家庭生活保障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农地上。在进入新世纪后,农民被迫将生产重心做了重大调整,由此也带来了一个连续四年的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过程(2000—2003年),到2003年粮食总产量跌到4.3亿吨。

② 在现行户籍制度之下,进城务工的农民处于一种“农村管不到,城市管不着”的非农也非工的地位。这样的一种格局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在大城市,农民工能够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比例只有百万分之一,因此农民工缺乏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低下,违法犯罪比例较高,工伤、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突出;春节民工潮给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城市无法让农民工安居乐业,使其处境很尴尬。

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报道,大中城市诸如郑州、石家庄以及重庆^①等在户籍改革方面均做了十分努力的工作,成效也不错,但客观的情况是:这些城市没有一家对进城务工人员实现无条件入籍,均设有这样那样的门槛,只不过各地入籍门槛高低有所不同罢了。在户籍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中,城镇户籍特别是大城市户籍的身份象征,在学者和决策者心中的地位依旧那么强硬,进城农民工被迫过着寄居城市边缘的生活。尽管从职业特性和居住特性来说,进城农民工已的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但从归属感角度看,他们依然是户籍所在地的农民,被迫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民曾先后尝试运用“离土不离乡(就地办厂)”,“离乡不离土(外出务农)”,“离土又离乡(外出打工)”等多种形式,以单个劳动力转移为核心,努力争取着本应属于自己的被无情剥夺了近20年的劳动自由与决策权。这一过程中运用最多也最为广泛的“离土不离乡”模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从土地承包责任制中释放出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其形成的产值也曾一度占到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但这种模式并没有得到政府长期而有效的(金融)支持。随着国企的改革、“三资”企业的引入,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明显放缓,在这一情景下以“离土又离乡”为核心的农民就业模式就成为改革中期的主要模式。随着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不断增多,出现了一波时间长达近20年的城市“民工潮”。

任何事情的形成都有它固有的原因,“民工潮”的出现也不例外。显

① 2010年8月,重庆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为突破口,全面启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在户籍迁徙政策方面,以农民工就业转户为前提,规定在主城区务工经商满5年或其他区县城区务工经商满3年的本市籍农民工,可以申请转为城镇居民,其配偶、子女、父母可以随迁,完全畅通了符合条件农民工的户籍迁移通道;在城市待遇政策方面,实施“五件衣服”(指医疗、养老、就业、教育、住房五大保障)一步到位,明确规定农民工转户后,同等享受城镇居民在医疗、养老、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福利待遇;在农村土地处置利用政策方面,明确规定转户不与承包地、宅基地挂钩;在保留农村权益政策方面,为防止农民工转户“急转身”带来问题,明确转户居民可以继续按规定保留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各项惠农政策,继续享有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在规定期内继续保留农村生育政策等与农民身份相关的待遇,最大限度地确保转户居民实现平稳过渡。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保证了农民市民化之后的权利保障,体现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配套改革理念。

然,农村恶劣的生存环境是形成“民工潮”的重要根源。但随着政府对农村发展的再一次重视以及世纪新农政的开启,在中国沿海存在了近20年的“民工潮”突然退去,随之出现的是一种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意看到的“民工荒”格局。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说一个新农政出台就把农村原本恶劣的生存环境改善了?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方面的原因的确是核心。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打拼了近20年的农民工“青春”已不在,但却因身份问题始终未能得到保障,20年的辛苦换来的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此情形下,那些希望到城市实现梦想的农民工重新回到自己的生身故地。显然,农民工放弃城市生活,并不是他们原来出去时就有的打算,实在是城市不“给力”的结果。事实上,农民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他们很快又找到发挥自己长处的就业门路,到城市郊区或山野从事自己最为擅长的农业。在大都市上海郊区,其农田种植基本都是由外来农民承包经营。尽管他们在经营时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补贴,且还要向农地使用权拥有者交纳数额不菲的租金,但这些外来农民依旧快乐地经营着,这是因为他们在大都市郊区的农业经营依旧较家乡的经营要划算得多。

2012年9月我有幸应邀到西藏农牧学院讲学,利用空闲到林芝八一镇周边的山寨做了一段时间的走访,发现在林芝大山里有不少来自内地的农民^①在这里从事山地藏香猪、藏鸡以及牛马的饲养活动。在与他们的访谈中,我看到了一种新的远离城市郊区的农民就业模式,即“离乡不离土”模式。尽管他们的居住与生活条件十分简陋,但从他们脸上流露出的笑容可以看出,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比较幸福的。只是由于户籍管理,他们不属于当地人,政府的公共产品阳光未能照到他们。例如,通往他们住地的交通就显得十分不便。看到此情景,我在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出路

① 在林芝八一镇的大山里我访问了一户来自四川资阳的杨姓农民。在驻守林芝的家乡子弟兵引荐下,杨先生携妻子来到人烟稀少的西藏林芝,在八一镇章麦村的大山下一住就是10余年。他与妻子共同经营着一个藏香猪养殖场,生猪存栏规模达300余头,年出栏量在200余头。这里的生猪像野猪一样满山跑,属于一种典型的散养模式。他们在租赁场地建了一些猪舍,只需每天晚上给猪喂些饲料,这些猪就会回到猪舍,这样,猪的走失率就大大下降。据杨先生讲,一头中等大小的藏香猪价值在800元左右,他们夫妇一年的净收入在10万元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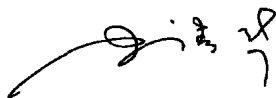
到底在哪？一个人烟稀少的大山都能把农民夫妇吸引来，而且一住10多年。他们抛家别子到底为了什么？农业经营到底有没有出路？类似他们这样在大山里经营生猪散养算不算一种就业？当地政府对他们的行为到底如何看待？从他们的经营绩效我看到了大山中一样可以致富的希望，只是这种希望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就需要政府组织力量加以研究。

从程名望同学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机理、动因和障碍——一个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主题，也是一个能够充分展示其才华的主题。论文运用局部均衡、一般均衡、静态均衡、动态均衡等现代经济学分析模式，从新古典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和行为主义方法三个视角，构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理论模型，并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分析中，作者采用经济学较为前沿的动态递归和博弈论等理论与方法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了实证，使内生增长思想、劳动力转移机理、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仅揭示了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力变迁的内在机理，更从一个政策层面提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未来农业增长与发展带来的挑战。论文的创新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一是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基本问题的回答，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机理是市场经济的资源（要素）配置原理，根本动因是城乡收入差距，根本障碍则是人力资本积累的缺乏和制度制约；二是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机理、动因与障碍的理论体系创新性构建；三是对新家庭经济思路的采用与验证。名望同学的这些努力不仅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更从实证角度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论文的学术价值正是基于他的这些努力才得以体现，同时社会对其努力也予以良好的回应。以该论文核心内容为基础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一文，发表在国内经济学顶尖期刊《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论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其转载引用频度达到154次（2006—2012年），年均达到22次。论文也于2008年获得国内农业经济学最高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论文）奖”（别名“杜润生奖”）。同年，程名望同学的博士论文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尽管程名望同学的博士论文写作非常成功，但也不乏有这样那样的

不足。比如，我这次在西藏大山中看到的“离乡不离土”的创业农民，他们的转移机理或动力是什么？基于这种模式政府的政策引导着眼点应放在哪？再比如，我开篇谈到的迁徙与转移主题，到底农民在何种方式下更能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更对自己有利？基于此，政策的变动应从哪个方向入手？等等，这些细微的不足可能是本书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当然，不足的完善与论文的出版是两回事。不足的完善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过程，而论文的出版则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在论文即将出版之际，作为导师，我首先向程名望同学表示祝贺，其次当极力向读者推荐该书。程名望同学的这本博士论文专著是国内近年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不可多得的一部学术专著，质量优，品位高，是高等院校教师、硕博研究生以及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的重要阅读书籍。最后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中肯的建议或有益的意见。



于西藏林芝八一镇

2012年9月24日

前 言

1978年以来,始于农村的改革给农村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进城务工,形成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进城务工的演变趋势,无论是“民工潮”,还是“民工荒”;无论是“招工难”,还是“找工难”,都给农民工就业、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2004—2012年,连续九个涉农“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工业化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乃至一个国家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发展历程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如传统农业)向现代部门(如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既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其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农村劳动力转移既是中国实现工业化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书是关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具体地说,是为描述和解释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机理、根本动因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一种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并运用中国的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做出实证分析。从框架结构和研究方法来说,本书基于新古典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和行为主义方法三个视角,运用局部均衡、一般均衡、静态均衡、动态均衡等现代经济学分析模式,建立了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并做出了实证分析,从而较全面地研究了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特别是运用动态递归、博弈论、计量分析等前沿理论和方法,把传统农村经济问题和现代经济学前沿思想结合起来,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发展和城镇经济增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对传统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进行了有益的补充。本书将为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平稳、持续地向城镇转移,并最终使农民工从“候鸟式”转移向“生根式”迁移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数据与政策依据。

本书的研究有如下发现:

(1)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轨迹波动较大,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在特点、影响因素、表现形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2)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机理是市场经济的资源(要素)配置原理,根本动因是城乡(或农业与非农业)收入差距,根本障碍则是人力资本积累的缺乏和制度制约。

(3) 农民工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按照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定自己的转移行为。但影响其转移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既有物质因素,也有精神因素。其中包括务工费用和收入、城镇生活收益、技能性收益、户籍制度、社会歧视、就业环境、城镇生活适应性、就业风险等。

(4) 经济总体增长以及各产业经济增长都对劳动力转移有显著的拉动作用。特别是产业资本投入和工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作用显著。而较多的农村人口数量和较少的耕地资源禀赋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和内在原因。

(5) 在进城动因和障碍、进城途径、进城费用与收入以及就业风险等方面,不同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农民工既表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或规律,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6) 农民外出务工和农村非农就业作为不同的劳动力转移形式,二者的影响因素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

基于上述研究,本书的创新点如下:

(1) 体系创新。本研究创新性地把新古典主义、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三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较全面地构建了劳动力转移机理、动因与障碍的一个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为从社会结构、转移者的个体选择、转移者的个体特征等多个方面较系统地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

(2) 思路创新。在新古典主义研究方法中,一方面,原有的研究成果大都仅仅以个人为研究对象,而本研究采用新家庭经济学的思路,同时把个人和家庭作为研究对象,特别是研究了家庭特征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这与新迁移学说认为迁移是家庭决策的结果而非个人决策的结果的理论

相一致,是对 Stark 新迁移学说的一种验证和分析。另一方面,原有的研究成果侧重于考虑物质因素对转移者转移决策的影响,而本研究运用一手调查资料,创新性地采用替代变量的方法,研究了就业风险、城镇适应性、技能性收益、户籍制度、就业机会、社会信息网络、政治地位等无形的精神因素对转移者转移决策的影响。由于这些因素的难以衡量性,数据的取得十分困难,所以本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创新性。此外,利用连续时间的搜寻模型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方法来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和创新。

(3) 方法创新。在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中,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是静态的,本研究采用动态递归方法,从动态均衡的角度重新分析了二元经济模型。分析创新性地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存在一个均衡的最优转移途径的,随着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技术进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将持续沿着最优路径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但当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一定阶段时,农业就业比重将相对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水平。此时,无论经济如何增长,农业就业比重也不会再大幅减少,本书创新性地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农村劳动力转移陷阱”。另外,利用岭回归分析法来研究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问题,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和创新。

(4) 结论创新。在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结论和政策建议。例如: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发生了质的嬗变,从原来被动地依靠农村推力嬗变到主动地依靠城镇拉力;进城的主要障碍因素,也从农村拉力嬗变为城镇推力。②是否农业户口对农村非农就业的作用并不显著,而对农民外出务工的作用显著为负。因此,如果户籍制度改革确有难处,那么中国的政策取向就应该是大力推进农村的非农产业。③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出台的减免农业税、粮食直接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对农民外出务工的作用并不明显,但这一系列惠农政策却对于农村非农就业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近年来的农业新政策的确对发展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善而成。该博士论文完成于2007年,被评为2008年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为反映博士论文的原貌,2007年之后笔者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未融入其中,书中相关数据也没有进行

更新,特此说明。由于笔者在博士攻读期间的研究水平问题,本书在框架设计、论证衔接等方面尚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于美国 RUTGERS 大学 COOK 校区

2012 年 9 月 28 日

目 录

总 序 序 前 言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内容简介	(4)
第三节 创新之处	(6)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9)
第一节 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9)
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与评述	(30)
本章小结	(36)
第三章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历史及现状分析	(38)
第一节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与趋势	(38)
第二节 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现状	(47)
第三节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69)
第四节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73)
本章小结	(77)
本章附录	(78)
第四章 基于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理论研究	(81)
第一节 基于成本收益视角的静态均衡分析	(82)
第二节 考虑非经济因素的静态均衡分析	(87)
第三节 基于搜寻模型的动态均衡分析	(91)
第四节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理论模型与分析	(95)
本章小结	(110)

第五章 基于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实证分析	(112)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特征分析	(112)
第二节 绝对收入、收入差距、相对贫困与劳动力转移	(118)
第三节 务农成本、进城费用、户口与劳动力转移	(124)
第四节 技能型收益、城镇生活收益、适应性与劳动力转移 ..	(127)
第五节 就业半径、就业机会、社会网络与劳动力转移	(130)
第六节 就业风险、就业环境、城镇歧视与劳动力转移	(132)
第七节 农村非农就业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	(135)
本章小结	(140)
本章附录	(141)
第六章 基于结构主义方法的理论研究	(143)
第一节 静态均衡模型及推导	(143)
第二节 动态均衡模型及推导	(150)
第三节 一般均衡模型及推导	(159)
本章小结	(164)
本章附录	(164)
第七章 基于结构主义方法的实证分析	(172)
第一节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172)
第二节 农业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180)
第三节 工业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187)
本章小结	(191)
本章附录	(192)
第八章 基于行为主义方法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197)
第一节 一个总体的 Probit 模型及分析	(197)
第二节 样本选择与样本特征	(202)
第三节 农民工进城务工总体趋势及年龄差异	(209)
第四节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性别差异	(220)